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

卢云峰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书名：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

作者：卢云峰著

出版社：辽宁大学出版社

ISBN：7-5610-5092-5 /I206.6

出版日期：2006

定价：45 元

序

高楠

云峰의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放在案头，她邀我为之写序。我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没有进行过整体性的“女性”角度的专思，但从文化角度、文艺学角度乃至美学角度，也能思及其中的一些问题。阅读是一个机会，一个对话的机会，对方的话语逼出自己的话语，一些潜隐的想法也便在阅读中跃出。中国古人很看重这样的对话机会，认为应答如邀，西方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也认为要通过话语聆听语言之说进而被语言所说，这强调的都是对话机缘。序，也是对话，与著作对话，与作者对话，与读者对话。

中国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研究在中国具有女性意识启蒙的性质，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这样。这构成同一领域同一当下，中国与西方的一个重要差异。西方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作为以性别为特征的社会思潮，经过 20 世纪中叶以后颇见规模的发动，包括社会活动的发动和理论发动，已形成有旗帜、有纲领、有组织、有声势的社会群体活动，成为一股不容小视的否定西方现存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关系及社会行为模式的社会力量。它们的理论代表所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位置，从根本上说在于它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否定性质，它义无反顾地汇入解构西方现实社会及现实社会理性的大潮。这种从性别上否定或解构现存社会体制的女性社会活动在中国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社会势力，也谈不上社会思潮及社会群体性的旗帜、纲领、组织及活动。当下中国以女性为标志的否

定或解构现实男权社会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思潮并未形成。因此，现实状况是中国女性文学及女性文学研究，像“五四”时代启蒙文学及启蒙文学研究承担着民族启蒙的历史任务一样，承担着对作为社会生存意识与发展的女权意识进行启蒙的历史与时代任务。因此可以说，这段时间里，女性文学的创作者与研究者，只要是相对于男权社会而特别地强调着女性角色、言说着女性话语者，便都可算是女性意识的启蒙者。

跨越了一个世纪，从“五四”至当下，在中国大地上，依然还是女性主义先驱们采用的启蒙式的自我张扬、奔走呼号、前赴后继的时代，这一片舞台，这一座讲坛，也仍然是上演着并无新意的以女性解放为主题的悲喜剧，发表着历史回响性的呼唤女性意识的激越演讲的舞台与讲坛。

为什么这一启蒙过程竟会延续得如此之久？为什么几代启蒙者的努力仍没有使启蒙者们改变所有先驱都难免的先步独行、寂寞等待、拒深取平的先驱角色？原因很复杂。中国女性在男权社会传统中受束太多，压迫太深，因此解束也格外艰难，这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属于中国女性传统生存状况的原因。中国女性传统概括地说就是封建伦理传统，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行，它的约束的充分性及无可逃避性，绝非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行为及法规条文式传统所能比。它在两千年前就已大体成为中国女性的生存定性。它的根基的深刻的合理性就在于中国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性根基——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为纽带的家族文化。家族文化的合理性在原初的生产关系中即原初的农耕生产关系是一种无可选择的生态规定。家族文化的历史合理性又奠基于原初的家族分工的合理性，这被称做自然性，即真正意义的性别分工——男忙于家外，女理于家中。男耕女织也好男狩女蓄也好，其原初的合理性都建立在性别自然的基础上，也建立在种族繁衍的基础上。其后，这一原初合理性被代代重复，成为世代相传的传统合理性。倘若历史在某一关键时期，能把这种男女分工的原初合理性仅限定在家庭

或家庭之中，女性在接受这一分工合理性同时又不止步于社会活动，扮演内外兼顾的社会角色，由此构建一个家庭与社会相分立的二元性社会，则中国女性的伦理约束或原初分工的约束将终止于家族或家庭边缘，并向社会角色过渡于家族或家庭边缘——当下的不少家庭就是这样，家庭分工并不影响女性的社会发展。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使女性走向家庭、社会二元化生存的关键时期。历史的实际情况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文化历史地转化为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对这种宗法血缘关系进行同构推行或同构放大的社会文化与国家文化。哪个人或哪个时代对这种历史转化负有责任，这可以作深入的学术研究，而且是很有价值的文化学、文化史学的课题。但这无关于已然如此展开的历史进程。历史所传承下来的，就是这种家国一体的男女分工，及维护这种家国一体的男女分工的家庭与社会伦理。而这种自然分工的历史延续结果，便是主外的男性权力的全方位扩大与主内的女性权力的全方位收缩，男尊女卑则是这种权力变故的伦理伴生物。原初的自然合理性也便成为后继的历史合理性，而后继的发生于两性权力变故的伦理伴生，虽则背离了原初的自然合理性却承领着历史合理性，并以历史合理性的名义不断进行男尊女卑的历史传承。后者的历史合理性否定着女性的自然生存权与发展权，阻止女性的社会伸展，它仅在民族文化的历史延续上表现为已然如此的合理，这是以牺牲女性权力为代价的合理——合历史已然之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对于女性而言不合理的历史合理性，赋予了女性的不合理境遇以历史合理的传统肯定，并使这种肯定经由细密的传统礼教成为传统女性的合理生存。男尊女卑的伦理传统便世代代地内化为女性的合理生存意识及合理生存的内在结构。理自内生，法又自内作，中国传统女性在男尊女卑的非理束缚中成为其合理的性别载体。这种伦理束缚之充分之彻底，在西方历史中唯有宗教束缚堪与相比。这是启蒙之难的女性生存原因。

从女性生存其中的男权社会而言，它充分地发挥了性别分工的

自然合理性，并且在之后的性别权力变故中不断地强化这一合理性，使男女分工的自然属性在阴阳相生相合中获得历史延续，并使之偷梁换柱地成为历史伦理属性。按照原初的自然合理性，女性无法独立于男性而生存，正如男性无法独立于女性而生存；同理，女性和男性一样也无法独立于家庭而生存。女性非家庭地求得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变进而求得解放的路途在家庭或家庭的合理性中被关闭。女性只能家庭地生存。而这家庭又恰恰是以牺牲女性的生存合理性而建构而维持而光宗耀祖的。女性基于自然分工的家庭生存的合理性与女性家庭中生存的不合理性相遭遇，由于这一遭遇是发生在家庭合理性这一场景之中，女性的任何反抗都无法离开这一场景，也都无法摧毁这一场景。女性的场景否定只能进行于场景的合理性现存之中。而女性经由斗争所换来的场景否定亦即家庭否定真严重到足以否定、摧毁这一场景或家庭时，则女性的家庭生存亦即女性生存的全部合理性也将随之丧失，否定将成为自身否定，摧毁也将成为自身摧毁。这就是以家为根基的宗法男权社会为女性设下的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男性并不派送自己的选手，因为整个竞技场就是男性的选手在场，它任女性在场上与并不出场却处处在场的男性对手格斗，其实她们是在与自己格斗，她们对于不出场却处处在场的性别对手的每一次胜利，都因她们不可能出离这一场景而化为自己的失败。母仪天下也好，女色倾城也好，垂帘听政也好，掌权用术也好，其实都是这男权竞技场上的女性独斗。女性的家庭宿命使她们处处是对手，但又没有反抗的对手，她们要么安顺于这一宿命要么虽则反抗但至死无胜。这样一种中国男权社会的场景性质自然使女性启蒙备加艰难。

西方历史上基本上没有这种奠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家国文化传统，因此也没有如此严重的女性家庭宿命。女性能在家庭之外找到自己的男权对手，她们或许尚未强大到征服对手，但她们握有征服对手的可能性。

百多年来，尽管中国传统的男权场景已被不断地革命、斗争、

变革所不同程度地解构或改建，但从根本上摧毁或迁移这一场景还远谈不上。而且，已然发生的种种场景变革，又始终是男性在发挥主力作用。女性的解放理性还很难在自身解放中有力而深刻地凝聚。自己的搏击利器尚在打造，西方之利器又难于用做中国女性之搏击。这便是中国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百年启蒙之艰难、之泥行、之坚韧的历史文化原因。

云峰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把研究视点集中在起于“五四”的现代，并在中国一代女性启蒙活动中，又进而聚焦于文学活动。这一选题意义在于它由此加入了旷日持久的中国女性意识启蒙的队伍，它本身就成为解读、播扬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启蒙的当代启蒙之作。中国女性解束与解放之艰难，使得中国女性历史地走着一条自赎之路，她们基本上没有真正的被解束与解放的女性意识所武装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女权领袖。这倒不是说自“五四”以来没有叱咤风云的女性革命家、政治家，而是说基本上没有专为女性解放而抗争男权社会的女性活动家。“五四”以来女性革命家政治家们的活动是与男性革命家政治家们一起进行的，大家争取共同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男性革命家政治家们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尽管也出现一些女性解放的潮流，如办女子学堂，女性走出家庭投身社会，自由恋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更大规模的男女平等，男女都一样的社会实践。但这都是以男性革命家政治家为主导的更多地体现着男权意识的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即女性的群体性解放只能在以男性意识为主导的社会变革中有限地实现，并且这一限度的主导执行者也仍然是男性意识群体。由此，男性便一直占据女性解放的意识主体与实践主体位置。其实，这也正顺应着源远流长的阴阳互依相生以阳为主导的历史传统，是历史传统的现代展现。这当然也是传统的男权意识的现代展现。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女性解束与解放的话语才成为自赎性话语，女性解束与解放的实践，也才成为少数女性的自赎性实践。她们主要还是性格性的个体冲击以及情境性的个体拼搏，她们用这样的冲击与

拼搏唤起社会的关注、不平、同情、支持，并唤起其他女性的启蒙。不过，在中国现代史中，这类启蒙者毕竟是女性中的少数；在那个闭塞重重，传媒远未发达的时代，这类直接行动的启蒙影响，很难造成强而有力的女性解放的群体性效应，实际上也没有造成这样的效应。与之相比，表现女性解放意识或取材于上述女性自赎活动的文学作品倒成为启蒙利器。这使得一代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女性解放的启蒙成为表象性启蒙，成为以文学表象为主要手段的社会启蒙。云峰领悟于此，着手于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通过自己的研究展示中国现代文学史女性文学的启蒙历程，展示女性文学书写者们通过文学启蒙的所思所想、所感所得，这显然是寻到了中国女性解束与解放意识启蒙的着力之所。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着手于陈衡哲，继之以冰心、庐隐、凌叔华、石评梅、丁玲、萧红、张爱玲、梅娘，所涉文体主要是小说、散文。这是一种长廊式的现代女性文学读解。所研究的人物及其作品，均堪称现代女性文学的范要或经典，通过对人物及作品的思索体现出史论的规模，并通过这一长廊式史论，告知今天的读者，这些女性解束与解放意识的先驱者们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心声，通过自己的体验，把中国现代女性的悲欢离合、情涌思沉、身世命运、心驰神往展示于文学表象；同时也让读者们看到这些女性书写者们鲜活的个性、神秀的心灵、精敏的体验、多彩的风格、应手的技巧；并在赞赏、感叹她们的作品及才艺的同时，沉思女性启蒙的历史路径，深思其间的苦涩、迷惘、无奈、沉重，探寻女性命运现实解放的历史谜底。这构成云峰《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的阅读价值。

云峰的研究没有更多地沉浸于文本读解，而是确认其特征，进行特征性研究，再把所研究对象的各自特征放入现代女性文学的历史长廊中予以审视与阐发。所有这些审视与阐发都注意把握中国现代女性启蒙的历史语境，追求合于人物生平的历史语境真实，而不是刻意于性别同一性的超乎历史实际的发掘。这使得她的研究避开

了很容易落入的“女性”樊篱——显然，在那个时代，多数女书写者都是在男权社会中进行写作，这是在书写意识中对男性不可或分的女性写作，这种书写意识总体上并未达到以整个男权社会为否定对象的程度。这应该是研究取向的历史符合性。如对陈衡哲，云峰就很明确地指出：“陈衡哲是以超然两性差异的姿态，以结构在美国求学时的生活题材而步入文坛的”。研究萧红，对这位在现代文学史中极具强烈的女权意识的女作家，云峰在强调她的女权意识的同时，没有忽略她依凭男权，逃避男权并超越性别地表现时代生活的书写意识与书写特点。

通过《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的长廊式陈列与研究，读者也可以看到那一时代的这些非凡的女书写者们是如何在自己的人生体验中而不是在观念中发现了“女性”，发现了“女性”的生存宿命，并进行表象性的文学自赎。这种非观念的“女性”的表象性自赎正是旷达一个世纪的中国女性解束与解放意识启蒙的历史性特征，而且至今仍然是其基本特征。云峰对此有所概括——“纵观这一时期的女性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以表现女性的自身世界为指归的。她们观照自己，观照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表现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认识”。不过，她更通过长廊式的展示，向读者交付了这种个性的表象自赎的结论：冰心书写的基督教精神，庐隐书写的自传根基，凌叔华书写的男性依附，石评梅的爱情原型，丁玲的叛逆取向，萧红的激越的孤独，张爱玲的绝世凄凉，梅娘的女性体验。她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书，但每个人又都是孤独的自赎者，她们彼此间巨大的个性差异，展示着那一代女性启蒙的时代性。不过，巨大差异中也有同一性，这同一性则在于她们都是女性，她们的差异性话语共说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女性之在，共陈着男权社会中的女性价值，共呈着大写的女性表象，引发被启蒙者们包括后来的启蒙者在共视中共思。《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发掘了所研究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这一重要女性启蒙的价值。

女性解束与解放的启蒙之旅尚很漫长，其中每一项专心致志的

研究都在进行着漫漫启蒙之旅的艰辛跋涉。中国女性尚须更有力度
的解放启蒙，中国男性们更尚须这样的启蒙。关心女性的各界人士
都当对这方面的成果投以关注，都当为这类成果的任何突进击掌助
势。因为中国女性的解放程度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与历史尺度。
云峰以其《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专题研究》为此做了可喜的努力。

2006 年春节 于沈阳家中

目 录

第一章 陈衡哲与中西合璧的女性意识·····	(1)
一、 陈衡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独特开端·····	(2)
二、 陈衡哲的性格特点与事业家庭兼顾的新女性主义·····	(9)
三、 陈衡哲的创作与中西合璧的女性意识·····	(16)
第二章 冰心“爱的哲学”与她的“问题小说”·····	(25)
一、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25)
二、 基督教对青少年时期的冰心及其创作的影响·····	(33)
三、 冰心“爱的哲学”的内涵·····	(39)
四、 宣扬冰心“爱的哲学”的“问题小说”·····	(49)
第三章 庐隐的自叙传与她矛盾人生理念下的痛楚·····	(61)
一、 自叙传:现代女性作家的写作途径·····	(61)
二、 现代悲情女作家庐隐与她的自叙传·····	(77)
三、 庐隐矛盾人生理念下的痛楚·····	(88)
第四章 凌叔华小说的创作视野与二三十年代的闺阁文学·····	(99)
一、 凌叔华小说的创作视野·····	(99)
二、 从凌叔华和曼叔菲尔的代表作谈起·····	(110)
三、 二三十年代的闺阁文学·····	(114)
第五章 石评梅与她散文的独特情绪底蕴·····	(123)
一、 风流才女石评梅·····	(123)
二、 寻找文学史中的石评梅·····	(134)
三、 石评梅散文的独特情绪底蕴·····	(146)

第六章	丁玲与女性文学·····	(157)
一、	女性文学的内涵·····	(157)
二、	现代女性文学的三个时期·····	(162)
三、	丁玲的写作描述·····	(168)
第七章	萧红小说的审美世界与《呼兰河传》的女性空间·····	(193)
一、	萧萧落红——一代才女萧红的人生与创作·····	(194)
二、	萧红小说的审美世界·····	(202)
三、	《呼兰河传》的女性空间·····	(214)
第八章	“传奇”小说、“流言”散文与“张爱玲热”·····	(223)
一、	超人才华 绝世凄凉——张爱玲的生平创作 ·····	(224)
二、	“传奇”小说评析·····	(232)
三、	“流言体”特色·····	(246)
四、	“文革”后“张爱玲热”与张爱玲研究状况·····	(251)
第九章	梅娘与其执著的女性书写·····	(267)
一、	梅娘创作的四个阶段·····	(268)
二、	“北梅”与“南玲”·····	(272)
三、	梅娘执著的女性书写·····	(280)

第一章 陈衡哲与中西合璧的女性意识

民国虽然易清而立，但长期以来女性在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上还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而陈衡哲没有向命运低头，能够以一个女性的身份，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通过读书，自强自立，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抱负，成为一个极不平凡的女子。她于1914年通过了清华学校向全国招考10名官费留美女生考试，进入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一——瓦沙女子大学学习，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留美期间，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创作。1917年先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日》，成为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后来进入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任国立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又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作为我国最早以西洋史为专业的女学者，著有《西洋史》、《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在学术界颇有影响。陈衡哲的文学著作主要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1928年）和《西风》（1933年），散文集《衡哲散文集》（上下册，1938年）。陈衡哲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学会学术会议，为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做出了贡献。抗战胜利后，陈衡哲出于对祖国的热爱，放弃了赴美定居的机会。建国

后，陈衡哲与从事科学研究的丈夫任鸿隽一直居住在上海，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因年老多病，与外界接触甚少，1976年1月7日病逝，享年86岁。陈衡哲的作品及其社会影响固然不能与鲁迅相比，甚至声名为后进的冰心、庐隐、凌叔华、苏雪林、石评梅等所掩，但作为先驱者，她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是不容忽视的，她作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人是不应该被后人忘记的。下面从三个方面，即陈衡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独特开端、陈衡哲的性格特点与事业家庭兼顾的新女性主义、陈衡哲的创作与中西合璧的女性意识对陈衡哲进行解构。

一、 陈衡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独特开端

在陈衡哲成长的道路上，舅舅对她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陈衡哲舅舅是一位向往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晚清官员，她从小就受到舅舅“造命”的人生观教育，立志学习独立的西洋女子，形成了自信坚定的个性和奋斗上进的人生态度。1914年留学美国，学习西洋史和西洋文学，全面接触西方现代思想，进一步发展了少时独立自强的意识。1917年，白话短篇小说《一日》的发表，使陈衡哲成为新文学第一位女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尝试白话小说创作的第一人，与鲁迅共享《新青年》杂志仅有的两位白话小说作家的殊荣。一般情况下，人们会认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创作的基本母题应该是为饱受几千年来的男权文化所压抑的中国女性哭诉缠绵，控诉罪恶，否则将无法显示出时代的变革和强烈的女性意识。然而，面对陈衡哲时，我们会发现她没有一般女性面对社会、男权世界所常有的对自己生命的恐惧和困惑，而是以女性无须证明自己的自信，坦荡地与新文学的第一代男性作家并肩而立，并把目光投向周围世

界，以其时代知识女性的独特视角，感受自然景物之美，抒写奋斗不息的人生观，表现关怀现实人生的人道主义精神，思考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以标志女性意识觉醒的诸如婚姻自由，如何获得独立自我等诸多困惑后世女作家的的问题，不仅对她来说不成其为问题，而且她是早已超越了男女两性的差异而以一位知识精英的姿态步入“五四”文坛的，因而使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有了一个独特的开端。

首先，陈衡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用白话文作文学的女性作家。1917年，陈衡哲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日》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第四卷第二期上。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卷》中说，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是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女作家。实际上，她发表的白话小说《一日》比鲁迅的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早一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真正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而非鲁迅的《狂人日记》。因其发表在国外，直到1928年陈衡哲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出版时收入这篇小说，才得以在国内面世，况且它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还十分不成熟，根本无法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因而在文学史上没能得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的殊荣。胡适在《小雨点·序》中说：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的时候，莎菲就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小雨点》等也是较早的白话短篇小说，此外陈衡哲还是早期白话诗的创作者，她最早的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发表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我们从当时新文学运动的状况，从当时用白话做文学的作家之少，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发表的时间背景，便可以了解陈衡哲的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当然她作品的影响力，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其次，陈衡哲是以超然两性差异的姿态，以结构在美国求学时的生活题材而步入文坛的。与其他女性作家相比，陈衡哲的作品相对而言多了些优雅的风度和明净的意境，而少了点缠绵哀伤。与所有女性作家一样，她有自己的女性经验，有自己的写作方式，但她

的女性经验与其他女性作家差异很大，她是一个得到男性承认和敬佩的女性，这就决定了她思考问题的角度与艺术表达的独特性。她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一日》，既没有像冰心那样通过小说传达出女性作家的细腻柔婉的情感世界，也没有像庐隐那样表现其人生追求的痛苦与幸福、抗争的悲哀与困惑，更没有像石评梅那样热衷于“精神自叙”，而是以知识精英的独特视角，采用“无结构”的散文化写法结构小说。《一日》有九个相对独立的片段连缀而成，叙述了美国女子大学新生一天的生活，生动、幽默，作者对自己熟悉的身边的生活，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纯朴自然，如生活本身一般。这是旧文学中从未有过的文体形式，这与其受西洋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严格讲，《一日》不算小说，充其量是散文化小说，但其意义十分重大：不仅在于它是《小雨点》这部小说集的起点，而且还在于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独特的光辉起点。

陈衡哲作为一位以西洋史为专业的学者，文学创作是她的副业，主要集中于新文学的头两个十年。第一个十年以诗歌、小说为主，兼有散文、杂文，第二个十年以散文、杂文为主。她的作品多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小说月报》、《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陈衡哲很少写自己不熟悉的生活，留美求学生活和童年生活是她写作的两大题材来源。短篇小说集《小雨点》是从陈衡哲 1917 年至 1926 年的作品中选出来的，共 10 篇，有《一日》、《小雨点》、《波儿》、《老夫妻》、《巫峡中的一女子》、《孟哥哥》、《西风》、《洛绮思的问题》、《运河与扬子江》、《一支扣针的故事》。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它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又说：“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

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作小说的唯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作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1] 这段话，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她写作的动机、经过，道出了一般作家的创作规律，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在“五四”思想启蒙的大潮中，在妇女解放旗帜的感召下，身在异域的陈衡哲写作的内容和风格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与同期的其他女性作家是有很大差别的。“真诚”是陈衡哲对社会现象的真实理解和她对人生的真实态度。其写实文学多以美国社会生活为背景，以美国人为主人公，表现出独特的异域色彩。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陈衡哲是反映异域人民生活的第一人。“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体现出陈衡哲可贵的创新精神。陈衡哲的创作体裁包括：现代白话小说、诗歌、散文诗、散文。这些体裁是有别于旧文学的崭新形式。陈衡哲创作的创新精神既有内容的创新，也有艺术风格方面的创新。

早在1930年，阿英就在《现代中国女作家》中说：陈衡哲的取材不像一般女性作家那样狭小，她能够跳出自己的周围从事创作。的确，她的作品充满了自由快乐的奋斗精神，能使读者不满于丑恶的现实世界，有激进向上的勇气。旧时代男性与女性在生活范畴上的区别在于男主外女主内，一道家庭的屏障隔开了女性与社会的接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挡了女性作家的视线，使她们转而注重于内视与内省。于是，写自我，写自我经历乃至自我的情绪感怀就成了女性作家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而长期悠闲的家居生活又给了她们强化这种独特细腻而又敏锐的感受能力的可能。“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虽然都已走出了家门接受了教育，但当时她们大都还年